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文卫平 著

语言意义 与语言习得研究

Studies on Meaning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湘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语言意义与语言习得研究

Studies on Meaning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文卫平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意义与语言习得研究/文卫平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438-5232-7

I. 语... II. 文... III. 语言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7586 号

责任编辑:张 凌

装帧设计:杨东平

语言意义与语言习得研究

文卫平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营销部电话:0731-2226732)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神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06000

ISBN 978-7-5438-5232-7

定价:26.00 元

序

自 19 世纪中叶 Mill 提出一个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的对象以来, 在 20 世纪, 语言的意义理论一直是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研究的热点。本人对语言意义理论的关注是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的, 我的研究方向是形式语言学, 从形式语言的视角研究语言各个层面的意义, 关注的焦点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传统逻辑语义学基础上产生的动态意义理论, 包括文档变换语义理论和新格莱斯意义理论 (新格莱斯会话隐含理论和新格莱斯语用照应理论)。

文档变换语义理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 Heim 提出, 它与话语表达理论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Kamp, 1981; Kamp & Reyle, 1993), 情景语义学 (*Situation Semantics*, Barwise & Perry, 1983) 以及动态谓词逻辑 (*Dynamic Predication Logic*, Groenedijk & Stokhof, 1991) 共同构成当代语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对传统的形式语义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其主要特征与基本思想是: 以动态的观点解释话语及相关的语言现象, 从而重构意义理论。

新格莱斯意义理论主要关注命题确定之前发生的系统的、有规律的语用推理, 其基本思想是隐涵决定外延。作为重新认

识语用/语义接面观的观点之一，它与属于动态语义学范畴的文档变换语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本书在梳理以上理论的同时，将其应用到汉语的语言事实，从句法层面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一些特殊、典型的句式进行了研究和考察。探索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研究的结合点，研究如何应用形式语言学理论来描写与解释汉语语言事实，实现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语言实际的有机结合，这将是理论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人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8月至2001年8月，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访学一年，师从Clément教授，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跨文化交际的视角考察第二语言习得。

第二语言习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多元包容的研究格局。以Lambert, Gardner, Clément, MacIntyre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家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的研究，在北美有着优良的传统，其研究成果影响深远。Clément, MacIntyre基于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基础上的交际意愿研究在西方得到广泛的认同。东方视角下语言学习者交际意愿的研究将交际意愿的研究从西方语境扩展到东西方语境，扩大了交际意愿研究的外延和内涵，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语言习得中的情感因素也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内容之一。了解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情感状态，重视其被评价意识和情感障碍，建构语言学习的积极情感背景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第二语言的习得。

第二语言习得其实也是一种跨文化教育。习得一种新的语

言，同时也是习得一种新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关系，祖国意识与国际视野的关系，跨文化交流与跨文化能力的关系，这些都是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不可规避的问题。妥善处理好这些关系，必须将第二语言习得与外语教学提升到跨文化教育的层面来研究。

本书关于语言意义和语言习得的研究历经数年，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以论文的形式在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过，现根据内容编成章节。书中虽有不少独到的思考和发现，但仍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期望得到学者同仁的指正。

本书写作分工如下：

第一章 文卫平

第二章 文卫平

第三章 第一、二节 文卫平；第三节 胡波，文卫平

第四章 第一、三节 文卫平；第二节 文卫平，Clément

第五章 第一、二、三节 文卫平；第四节 黄红安，文卫平

第六章 第一、二节 文卫平；第三、四、五节 吴庄，文卫平。

本书的写作得到许多同仁的指教，并参阅了相关学者大量的研究文献，从中获益良多。本书的出版得到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湘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文卫平

2008年3月1日

目 录

上篇：语言意义研究

第一章 新格莱斯意义理论与动态语义理论····· (1)

1.1 新格莱斯意义理论 ····· (1)

1.1.1 GCI 镶嵌在语义表达层 ····· (2)

1.1.2 GCI 对真值条件内容起作用 ····· (5)

1.2 文档变换语义理论 ····· (11)

1.2.1 文档变换语义理论的产生 ····· (12)

1.2.2 文档变换语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与形式 ····· (14)

1.2.3 文档变换语义理论的特点及意义 ····· (21)

第二章 新格莱斯语用理论····· (29)

2.1 新格莱斯语用照应理论 ····· (29)

2.1.1 Levinson 的语用分析模式 ····· (29)

2.1.2 Huang 的修正模式 ····· (41)

2.2 否定词提升的语用解释 ····· (45)

2.2.1 否定词提升触发词 ····· (46)

2.2.2 否定词提升解读的语用推理机制 ····· (53)

第三章 汉语相关问题的句法语义解释····· (56)

3.1 汉语不定名词关联结构与驴子句 ····· (56)

- 3.1.1 “一 + (量词) + NP……一 + (量词)
+ NP”: 类指解读 (57)
- 3.1.2 “一 + (量词) + NP……一 + (量词)
+ NP”: 全称解读 (68)
- 3.1.3 “wh……wh”: 全称解读 (74)
- 3.2 汉语同语反复对举句式及其语用意义分析
..... (80)
- 3.2.1 汉语同语反复对举句式分析 (81)
- 3.2.2 汉语同语反复对举句式的语用意义 (88)
- 3.3 A + I 结构主动词后名词短语的句法分析 (93)
- 3.3.1 R to O 和 ECM 分析 (93)
- 3.3.2 最简方案框架下的 A + I 结构 (95)
- 3.3.3 汉语 A + I 结构的提升与控制研究 (103)

下篇: 语言习得研究

- 第四章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交际意愿 (107)
- 4.1 跨文化交际中的思维定式 (107)
- 4.1.1 思维定式释义 (107)
- 4.1.2 思维定式的产生与发展 (110)
- 4.1.3 思维定式对跨文化交际的负面影响 (115)
- 4.2 A Chinese Conceptualization of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ESL (120)
- 4.2.1 Cultural Origins of Un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122)
- 4.2.2 WTC in the Chinese Setting (131)
- 4.2.3 Empirical Implications (151)

4.3	Foster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a Language Class	(153)
4.3.1	Supportive Classroom Climate	(154)
4.3.2	Intimat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158)
第五章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情感因素	(162)
5.1	外语学习积极情感背景模式	(162)
5.1.1	理论基础	(162)
5.1.2	基本要素	(165)
5.1.3	基本原则	(167)
5.2	中国学生被评价意识	(171)
5.2.1	外语交际过程中的被评价意识	(171)
5.2.2	中国学生被评价意识的文化探源	(173)
5.3	师生互动中信息传递操作误差与课堂窘迫	(178)
5.3.1	师生互动的三个侧面	(179)
5.3.2	信息传递操作误差与课堂窘迫	(180)
5.3.3	信息传递操作误差的矫正	(183)
5.4	英语学习动机组成因素的考察——一项 实证研究	(187)
5.4.1	研究背景	(187)
5.4.2	研究方法	(189)
5.4.3	研究结果与讨论	(190)
5.4.4	教学启示	(198)
第六章	第二语言习得与外语教学及跨文化教育	(204)
6.1	后殖民语境的后殖民英语及英语教育	(204)
6.1.1	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话语	(204)
6.1.2	后殖民语境与后殖民英语	(208)

6.1.3	英语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	(213)
6.2	后殖民英语及跨文化教育	(216)
6.2.1	后殖民英语的兴起	(217)
6.2.2	后殖民语境的英语教育	(226)
6.3	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及英语教育中的跨文化 能力培养	(230)
6.3.1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概念及特征	(231)
6.3.2	EIL 教育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	(235)
6.4	ECUP 模式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239)
6.4.1	CUP 及其扩展模式 ECUP	(241)
6.4.2	ECUP 对外语文化教学的启示	(245)
6.5	第二语言习得的深层共享能力假说	(248)
6.5.1	CUP 假说的理论框架	(249)
6.5.2	CUP 假说的影响及发展	(253)
6.5.3	对 CUP 假说的思考	(255)

第一章 新格莱斯意义理论与动态语义理论

1.1 新格莱斯意义理论

新格莱斯意义理论是指 Levinson (2000) 在 Grice (1975) 框架上发展起来的先语义语用理论, 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 语言意义理论有赖于而不是独立于语言交际理论 (Levinson, 2000: 187)。虽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形成一种公认的语言交际理论, 但习惯上人们将语言交际理论采取二分法, 即: 句子意义层 (sentence-meaning) 与话语实例意义层 (utterance-to-ken-meaning)。句子意义由语法解释; 话语实例意义由语用理论作出解释, 是 Grice 的非自然意义概念, 指说话人在具体语境中的或然的语用推理。Levinson (2000: 22) 认为, 语言交际理论二分法有不足之处, 它低估了语用推理的规律性、重复性与系统性。基于此, 他提出了话语类型意义 (utterance-type-meaning), 将语言交际理论分为句子意义、话语事例意义、话语类型意义三个层面。话语类型意义是一个系统的语用推理

层,它不是对说话人意图的直接的计算,而是对语言如何正常使用的一种期望。这种期望产生与内容、语力有关的假设、默认推理等。只有在这一层面,才有可能讨论言语行为、预设、会话隐涵、合适条件、优选结构等(Levinson, 2000: 23)。

话语类型意义的提出,发展了 Austin (1962) 的言语行为理论与 Searle (1975) 的间接言语行为说,突显了话语解释过程的语用推理作用以及优选解读的语用推理机制,是新格莱斯意义理论的前提与基础。话语类型意义的确定,将 GCI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引入意义研究,丰富了意义研究的内涵。GCI 在指派真值条件内容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使人们以动态的观点重新审视语用/语义的接面问题。

1.1.1 GCI 镶嵌在语义表达层

Levinson 的意义理论是建筑在 Grice 意义理论基础之上的。Grice 提出了明示 (what is said) 和隐涵 (what is implicated) 两个概念,明示相当于命题或话语的真值条件内容,属于语义层面。隐涵则属于语用层面。按照 Grice (1975) 的思想,确定明示内容之前,必须确定指称、指示语,必须消解歧义,而隐涵又与语词的意义与指称的确定有关。明示对隐涵起作用,隐涵又建立在明示的基础之上。明示表达命题内容,又有赖于指称确定、指示意义的确定、歧义消解等语用手段 (Levinson, 2000: 171), 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格莱斯怪圈” (Grice Circle), 如图 1 所示:

图 1 表示的是传统的语义/语用关系: 语义在前,语用在后,语义是语用的输入。但是,语义层面涉及组构语义学,有语义表达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即语义表达 (semant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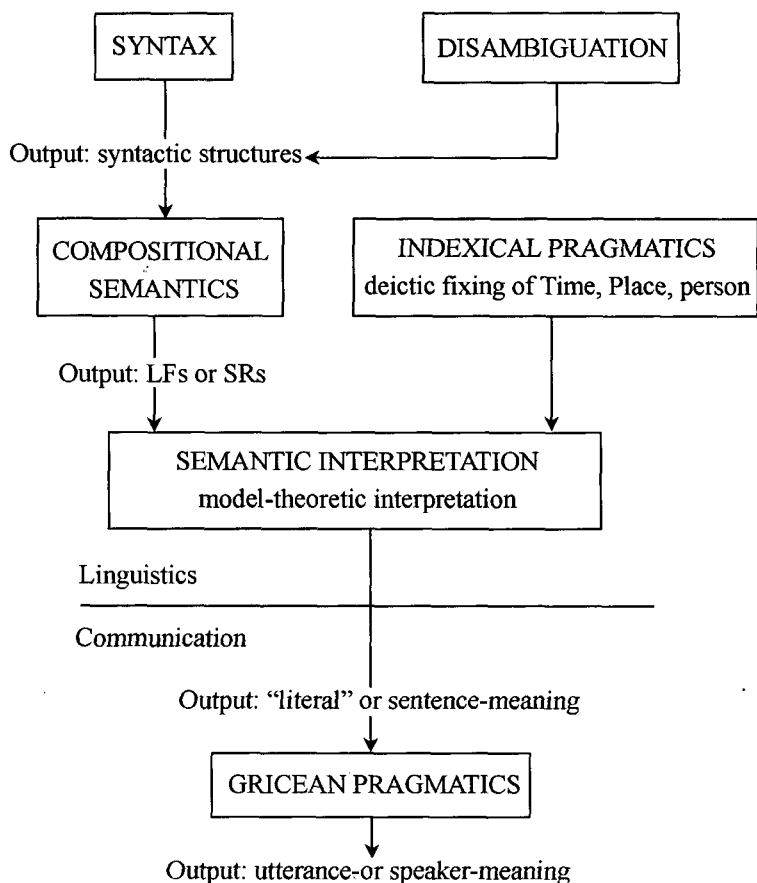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的语义/语用关系 (Levinson, 2000: 173)

representation) 与语义解释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两个操作程序, 这两个操作程序的启动分别与歧义消解、指示语的确定等语用手段有关。语义表达之前, 首先要消解歧义; 语义解释之前, 要确定指示意义。也就是说, 在语义层面明显的存在语用介入, 隐涵对明示起作用。Levinson 认为, 语义过程与语用

过程是相互交叉的 (interleaved), 语义过程中有部分语用介入, 这一点似乎已形成共识, 但是, 语义过程中存在系统的、有规律的语用介入, 对于这一点, 则认识不足, 而认识到这一点, 势必重新认识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关系。

Levinson 在剖析格莱斯怪圈时, 全面描述了 GCI 对语义表达的系统的、有规律的介入。GCI 对歧义消解、指示语意义的确定、指称确定以及 Grice 没有提及的省略补充、语义缩窄等语用过程全面发挥作用。正如 Capone (2001) 所指出的, GCI 镶嵌在语义表达中。

以指示语的确定为例, 传统的观点认为, 它与一般的语用推理没有关系, 更谈不上 GCI 的介入, 但 Levinson 对此提出了挑战, 指示语意义的确定同样是 GCI 介入的结果:

(1) *Take those three drinks to the three people over there.*

在 Levinson 看来, 句 (1) 的指示语 “three drinks” 应理解成 “exactly three drinks”, 因为在没有手势的情况下, 如果有两处放着酒杯 (一处正好 3 杯, 另一处正好 4 杯), 那么, 指示语 “three drinks” 可同时指这两种情况。然而, 在这里话语表达是合适的, 因为听话人会用等级量隐涵 (scalar-implicature) 来确定说话人指示的究竟是哪一处, 故

(2) *Take those three drinks to the three people over there.*

$Q \rightarrow$ *Take those drinks that are exactly three in number to the three people over there.*

同理, 指时间, 特别是星期的指示语的确定也与 GCI 介入有关。

(3) *The meeting is on Thursday.*

假设说话的时间在星期三, 那么, 如何确定指示语

“Thursday”? 是指明天还是下个星期的星期四? 根据 GCI 原则, 此处的“Thursday”势必 Q-隐涵“not tomorrow”, 因为“tomorrow”是信息量更大的表达形式, 而说话人没有使用这个表达式。如果说话人确指“tomorrow”, 根据 Q-准则, 他必须明说, 所以

(4) *The meeting is on Thursday.*

$Q + > \text{“not tomorrow” when tomorrow is Thursday}$

显然, 在指示语意义的确定过程中, 有了 GCI 的语用介入, 就能得到确切的命题内容。歧义消解、指称确定、省略补充、语义缩窄同样离不开 GCI 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 GCI 与语义表达捆绑在一起。

1.1.2 GCI 对真值条件内容起作用

隐涵对真值条件起作用, 这是贯穿 Levinson 意义理论的主线, 也是其意义理论的精髓。这种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某些语用介入结构与限定摹状词的指称确定上。

1.1.2.1 语用介入结构

Levinson (2000: 198) 认为, 在某些情况下, 不首先考虑隐涵, 所赋的真值条件将是假的。这样的情况存在于某一类语言结构中, Levinson 将之称为语用介入结构 (intrusive constructions), 如比较句、条件句、元语言否定等。这类结构的特点是, 整体的真值条件取决于部分的隐涵。

比较句

作为语用介入结构的比较句主要以 “A is better than B” 的格式出现, 如 “It’s better to eat your meat than to ingest it.” “Having three children is better than having four children.” 这时

整个结构的真值条件的计算需考虑分句部分的隐涵。A 与 B 在逻辑上等值，但语用上有区别，这样，结构的替换在直觉上为真，在语义上为假。分句的隐涵决定整个句子的真值，分句隐涵包括 Q-隐涵、M-隐涵、I-隐涵，也就是说，GCI 在比较句中全面介入，发挥作用。

下面分别选取了 Q-隐涵、M-隐涵、I-隐涵介入的例子：

(5) a. *You should get out of stocks; I know you have already lost a lot, but a large loss is better than a large and possibly enormous loss.*

b. *It's better to take a considerable effort than a not inconsiderable effort.*

c.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a child is better than having a child and getting married.*

在 (5a)，“large”在语义上与“enormous”兼容，所以 A 句的“a large loss”与 B 句的“a large and possibly enormous one”外延相等，然而语句并不矛盾，原因就在于 Q-隐涵的介入。在级差 < enormous, large > 中，“large”Q-隐涵“not enormous”。这样，A 与 B 是有区别的，“A is better than B”成立，整个句子为真。

(5b) “not inconsiderable”为曲言，然而这里的双重否定并不意味肯定，这是 M-隐涵介入的结果。根据 Horn 的语用分工，如果两个表达式表相同的意义，那么有标记的表达式的解读是无标记表达式解读的补。“not inconsiderable”较之于“considerable”来说是有标记的，故“not inconsiderable”M-隐涵“close-to-considerable”。这样，A、B 在语义上相等，在语用上有别。

(5c) 从形式上看是矛盾的, 如果以 p 表示 “getting married”, q 表示 “having a child”, 那么, A 句的形式为 “ p and q ”, B 句的形式为 “ q and p ”, “and” 相当于真值条件联结词 $\&$, 这样, $p \& q \equiv q \& p$, 整个句子为假。但是 I-隐涵介入后, “and” 可以强化为 “and then”, 整个格式变成 “ p and then q is better than q and then p ”, 全句为真, 分句的隐涵决定了整个句子的真值条件。

条件句

条件句作为语用介入结构的格式是 “if A then B”。Kamp (1981) 指出, “if A then B” 为真的条件是, A 为真, 同时保证 B 也为真, 这是纯语义分析法。Levinson 考察了语义上预测为真, 直觉表明为假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GCI 的语用强化介入在决定整个句子真值条件内容时起重要作用 (Levinson, 2000: 205 ~ 208):

(6) a. *If you ate some of the cookies and no one else ate any, then there must still be some left.*

b. *If he turned on the override switch and the reactor overheated, he's responsible for the disaster.*

c. *If it's a long way to your place, we can make it; but if it's a long, long way, we may not be able to.*

(6a) 是 Q-隐涵介入, 先行词 “some” 只有强化成 “some and not all”, 整个句子才可能为真。(6b) 的真值条件取决于 “and” 的信息扩充, 即由 “and” 强化成 “and then”。在 (6c) 中, “long” 不是语义上的调整与修正, “long, long” M-隐涵比 “long” 更远的距离, 这样整个句子就不至于前后矛盾。